纪念厉以宁先生

经济非均衡、市场主体和转型发展
——厉以宁经济思想述评

王曙光
(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 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众多经济学思想流派中,厉以宁是所有制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比较经济史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对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厉以宁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非均衡理论、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所有制改革优先论、体制—目标—人的经济学研究范式、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道德调节和效率双重基础论以及外国经济史研究等七个方面。

关键词: 厉以宁;经济非均衡;所有制改革;转型发展;外国经济史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3)03-0163-11

引言: 独树一帜,体系恢弘

在中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进程中,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如何对中国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中国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还有“宏观改革优先派”“经营权主导改革派”“制度学派”,等等。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外国经济史学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学养深厚,在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七个方面评述厉以宁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

收稿日期:2023-03-14
作者简介:王曙光,男,山东莱州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道德调节和效率双重基础论;(七)以古鉴今,洋为中用:自成体系的外国经济史研究。

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 1874 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 20 世纪的 50 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 1936 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60 年代后期产生了以帕廷金、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和格罗斯曼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巴罗内、兰格、科尔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非均衡特征进行了系统的研究①。

厉以宁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厉以宁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②,提出了“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

---

① 厉以宁:《西方非均衡理论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借鉴意义》,《求是》1988 年第 3 期,第 22—26 页;刘伟、平新乔:《西方学者论社会主义非均衡》,《管理世界》1989 年第 4 期,第 94—107 页。

② 厉以宁早期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非均衡的描述,参阅厉以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四、十一、十八章,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116—120、288—298、458—465 页。在这本写于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的著作中,厉以宁还沿用“失衡”和“平衡”的术语,尚未明确提出“非均衡”的概念。

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主权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①。

厉以宁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主权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问题是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命题,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机制自动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理论以及此后的市场失灵和国家干预理论经历了长期的论争。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③。通过区分

---

① 厉以宁:《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8—39 页。

② 厉以宁:《经济、文化与发展》,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55—68 页。

③ 厉以宁:《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第 2—8 页;厉以宁:《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92—98 页。

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按照厉以宁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厉以宁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

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科斯在 20 世纪 30 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①。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相当深远,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 60 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②。在 1986 年 4 月 25 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③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禁区"而在实践过程中备受磨难,厉以宁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

---

① 平新乔:《非均衡体系下的企业与市场——兼论厉以宁的"企业改革优先"思路》,厉以宁:《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第 218—228 页;刘伟、平新乔:《东欧、苏联与中国改革学者关于市场地位思想的比较》,《社会科学辑刊》1989 年第 1 期,第 42—49 页。

② 在厉以宁的所有制改革思想中,产权改革是所有制改革的核心部分,但是产权改革却并不是所有制改革的全部,所有制改革涉及更广泛的内容,它包含三部分:第一,产权改革,通过产权改革来界定和明确产权,建立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第二,各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从所有制的单一化走向所有制的多元化;第三,探索并建立新的接近于社会所有制的公有制形式。参见厉以宁:《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问题》,《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7 页。

③ 厉以宁:《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第 3 页。

系。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单纯强调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具有操作性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进行系统设计和协调配套推进,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在降低社会震荡成本的前提下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变革。

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问题一直是一个令人困扰的核心方法论问题。在厉以宁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①。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厉以宁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②。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

---

① 厉以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 531 页。

② 厉以宁:《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2 页。

“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①。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②。

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由于传统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

①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设想,厉以宁在较早期的著作中有初步的表述,参见厉以宁:《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第 402—403 页。本文作者根据自己对厉以宁其后的经济改革理论研究成果的理解,在认同厉以宁基本理论观点的基础之上对这种理想体制进行了重新表述。

② 关于对发展目标和“人”的研究,除《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这部专著之外,参见厉以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十七章《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综合体系》以及第十九章《衡量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实现程度的标志》,第 443—457、518—530 页。

赖特征,迫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在他90 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①。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 90 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②。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认为,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

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道德调节和效率双重基础论

经济学与伦理学有着深刻的渊源。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 20 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厉以宁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

---

① 厉以宁:《转型发展理论》,北京:同心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7 页。

② 厉以宁:《转型发展理论》,第 18—71 页;厉以宁:《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第 42—87 页。

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①，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由此，厉以宁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②。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厉以宁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代理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七、以古鉴今，洋为中用：自成体系的外国经济史研究

厉以宁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就读期间，经济系在教学和研究体系中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并重的学术风格对厉以宁的经济史学研究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他从陈岱孙、徐毓枬学习经济思想史，从赵迺抟、周炳琳、陈振汉学习经济史，因此在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方面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基础。厉以宁在外国经济史学方面成果丰硕，陆续出版过《希腊古代经济史》（上下编）、《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上下编）、《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工业化和制度调整》、《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与罗志如合著）、《厉以宁经济史论文选》等经济史著作，卷帙浩繁，自成体系。厉以宁的外国经济史的研究，有几个最鲜明的特点：第一，他的经济史研究往往与经济思想史（经济学说史）的研究紧密地有机地

---

① 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258 页。

② 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29 页。

融合在一起,既注重对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本身(即经济史)的理解,又注重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经济思想史的解读,即从思想史的脉络出发,对不同学者的经济史解释框架和理论观点进行比较,从而形成了“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的“二维方法论”特色;第二,他的经济史研究往往从比较的角度出发来研究问题,比较经济史学方法可以说一以贯之,如在研究罗马—拜占庭帝国的研究中,他对罗马的专制主义与东方的专制主义进行比较,将拜占庭的封建制同中国以及西欧的封建社会进行比较,再如在研究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时候,将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欧封建社会进行比较,从而获得丰富的结论;第三,他的经济史研究以制度调整为主线,注重不同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制度调整过程及其路径选择特征,尤其是以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的比较为主线来解释历史上不同国家的制度变革过程以及绩效,这一方法论特征体现在他关于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以及欧洲资本主义起源以及工业化史等几乎所有经济史研究中;第四,他的经济史研究的落脚点在于研究中国的现代化路径选择,在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外国经济史研究作为镜鉴,以便探索中国现代化和经济改革的最佳路径①。

在考察欧洲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时,厉以宁针对西欧的封建制度提出了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的划分。刚性体制是指统治者的治理体制本身是僵硬的,不容许有重大的改变,很难进行内部的制度调整,以确保制度的存在和延续;弹性体制是指在不违背统治者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前提下容许制度的渐进改变,统治者以相对灵活和富于弹性的方式进行统治,以确保制度的存在和延续。刚性体制和弹性体质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统治方式,刚性体制同僵硬不变的统治方式和治理模式相联系,弹性体制同灵活可变的统治方式和治理模式相联系。厉以宁认为,西欧封建社会就是一种刚性体制,它以农奴制来限制人身自由,并利用等级制和身份制对社会流动(社会身份改变)进行严格的限制,使得垂直的社会流动不可能在体制内实现,这种刚性体制经不起体制外异己力量的冲击②。厉以宁还深入研究了中国传统经济体制演变过程中由刚性体制向弹性体制过渡的问题,他认为这种过渡发生于唐宋时期(尤其是宋代基本奠定了弹性体制的基础),其主要制度表现是人身依附制为标志的身份制不复存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制不复存在、垂直社会流动不受限制,这一观点发人深省③。能否具备一种由刚性体制逐步转换为弹性体制的内在机制,从而实现制度的适时调整,决定了制度变迁的绩效。厉以宁认为,以弹性体制和刚性体制以及制度调整作为基础性范畴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调整,对于理解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体制亦可以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思路。他把这种“弹性—刚性体制”的分析范式也应用到关于“英国病”的研究中去,提示我们一方面要看到 20 世纪日益严重的“英国病”,看到英帝国衰落的悲惨境况,但同时也要看到 20 世纪英国在处理“帝国危机”过程中其灵活的富于弹性的政治体制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如果它(英国)的政治结构不是像如今这样具有较大灵活性和可变性的资产阶级政治结构,那么患上了这样多种病症的英国社会也就不会是今天这种情况了”④。在《工业化与制度调整》一书中,厉以宁详尽分析了西欧各国工业化进程中资本主义体系的制度调整,即在工业化中期之后由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刚性体制转换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弹性体制——即从完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转向市场和政府相互协调的更具弹性的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以缓和社会矛盾并处理社会民生以及经济波动等问题⑤。厉以宁所强调的这种体制上的灵活性和弹性,这种由刚性体制向弹性体制不断过渡从而实现灵活有效及时的制度调整的方法论,对于我们今天理解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极为有益的,这一弹性体制和制度调整的方法论几乎贯穿于厉以宁最后十几年的所有著述。

---

① 厉以宁:《厉以宁经济史论文选》,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563—572 页。

② 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45—53 页。

③ 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第 345—578 页。

④ 罗志如、厉以宁:《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604 页。

⑤ 厉以宁:《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504—609 页。

结束语:学术人格,薪火相传

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革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独立不倚的学术品格、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厉以宁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主体性、为中国经济学争得国际性的荣誉,做出了突出的学术贡献,他所创建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已经成为西方认识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重要知识媒介。但厉以宁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他从大量实地调研和理论研究入手,以自己对中国经济的深刻洞察和数十年精研深思而提出自己的理论命题,他的理论创造根植于中国改革的丰富生动的实践,他的学术范式和思想也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特殊印记。厉以宁《鹧鸪天 · 大学毕业自勉》曰:“溪水清清下石沟,千弯百折不回头。兼容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怀鱼自游。　　心寂寂,念休休,沉沙无意却成洲。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①这首词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他一生治学精神的写照:虽历经磨难而百折不挠,在学术上兼收并蓄,广采博通,虚怀若谷,只事耕耘而不计收获,终于成就一代大家。坚守学者的人格操守,以淡泊虔敬的心态处世做人,以谨严诚实的态度奉献于学术,这就是以厉以宁为代表的百余年以来数代北大经济学人的品格。

Economic Non-equilibrium, Market Entity, and Transformational Development: A Review of Li Yining's Economic Thought

Wang Shuguang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100871, *China*)

Abstract: Among the many schools of economic thought o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and development, Li Yining was the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the School of Ownership Reform. He had profound attainments in Western economics,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study of national economic management, theory of economic reform, and comparative economic history, and created a unique and systematic ideological system which made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Chinese economics and the practice of economic institutional reform. This paper reviews Li Yining's main economic though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on-equilibrium theory,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market regulation, the theory of the priority of ownership reform, the institution-goal-human paradigm in economic study,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theory of dual bases with moral adjustment and efficiency, and the study of foreign economic history.

Key words: Li Yining (厉以宁); economic non-equilibrium; ownership reform; transformational development; foreign economic history

(责任编辑　郭昌盛)

① 厉以宁:《厉以宁诗词全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8 年版,第 93 页。